

从 童工 到 经理



郭光甲 著

从童工到经理

——一个旅日华侨的自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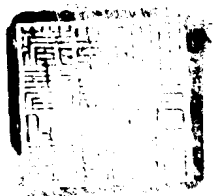
郭光甲

DB-2/56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024692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024692

从童工到经理

——一个旅日华侨的自述

郭光甲

*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长春市第二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4.125印张 65,000字 插页：精8、平8

1985年6月第1版 1985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120册

统一书号：10377·2 定价：精：2.10元
平：0.90元

目 录

献给祖国的亲人 (1)

	引子	(5)
一	绑票事件	(7)
二	五块大洋	(14)
三	只身去日本	(18)
四	机灵的小学徒	(24)
五	一道名菜	(32)
六	结婚	(36)
七	告别“天仙阁”	(42)
八	接妻子去日本	(45)
九	大空袭	(51)
十	停战前夕	(56)
十一	停战以后	(60)
十二	采购风波	(63)
十三	害群之马	(74)

十四	迁往东京	(78)
十五	担任“中华俱乐部”	(80)
	代理理事长	(74)
十六	不忘报恩	(83)
十七	“万寿山”	(87)
十八	顾此失彼	(93)
十九	创办“八仙阁”	(97)
二十	中日友好	(102)
二十一	京剧、相声迷	(110)
二十二	难忘的祝酒和题词	(115)
二十三	漫长的路程	(119)
	代跋	(125)

献给祖国的亲人

郭光甲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在刚刚建社之际，就热情地出版了我的拙作——《从童工到经理》。这使我又一次感受到祖国的亲切关怀和热情鼓励，真是感到无比的温暖，万分的激动！

我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呢？

俗话说“树高千丈，落叶归根”。我要把这本书作为海外赤子的一片心，献给祖国，献给祖国的亲人。

我从十五岁离开故乡，到今天算起来已经整整五十个春秋了。但是故乡的山山水水，故乡的老老少少，故乡的一草一木，我一天也没忘记过。我出生在山东，童年是在山东度过的。这些年来，我一想到故乡，就想到祖国；一想到祖

国，就想到故乡。国家，国家，国连着家，家连着国。在全世界，我不论到哪儿，都高兴地告诉人们，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山东人。

我写这本书就是想告诉亲人们，在我的那些身处异国的日子里，在我洗碗、洗菜、切菜、炒菜、干些零活的时候，在我提盒送菜的时候，我常听的是京戏，是相声，是祖国的乡音。当我遭到破产，在进行挣扎的时候，我想到的是我们中华民族所固有的勤劳和勇敢的奋斗精神。总而言之，是祖国，是故乡给了我力量，给了我勇气，帮助我度过了那辛酸和挣扎的岁月。

我不是生在官宦之家，也不是富豪子弟，我没有钱留学，更不是为了镀金才出国的。我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的家里，童年的时候，正赶上国难当头，内忧外患，民不聊生的苦难岁月。我是被迫漂流异国谋求生路的。在这本书里，就记载着我童年的辛酸和壮年挣扎的足迹。这是向祖国亲人的报告，也是想借此机会和青少年朋友谈谈心。假如书中的内容能引起朋友们的兴趣，并有一一点什么用的话，我将感到幸福。

我们生活在海外的中国人，不论是谁，在外

国人眼里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中国人。因此，我不管干什么，常常想到不能给中国人丢脸，要为中国人争光。不仅要让外国人知道我们中国人勤劳、勇敢，还要让他们知道我们善良。所以，当我的生活有了好转之后，我就为中日友好做点贡献。每年，我都在我开设的“八仙阁”饭庄招待敬老院的老人和孤儿吃饭，捐些款，向日本儿童介绍我辛酸的童年。日本儿童听了我的介绍，给我写来了很多的信。他们并不单单感激我个人，而是称颂中国人善良宽厚的品德。

中日战争结束了，我们抬起了头。祖国解放了，我们更是挺起了腰。中日邦交建立了，我们从心底里感到高兴。特别是“四人帮”垮台之后，祖国和海外的渠道开通了！从此，我们可以自由地回国探亲、参观访问了。祖国的领导访问日本时，有的还亲自为我题词、敬酒。领导人的关心，使我更加感到祖国的温暖。

我在日本生活已经整整五十年了，经历了半个世纪以来中日两国从交恶到友好的全部过程。五十年的亲眼目睹和切身感受，使我看到两国人民都是热爱和平，要求友好的。今天胡耀邦总书

记和中曾根首相热情提倡和支持两国友好的二十一世纪委员会，邀请两国青年互访，为中日两国世代友好奠定了基础，这完全代表了两国的意志，是两国人民的衷心愿望。这本小小的书，如果能在中日友好的伟大事业中，起到一点微小的作用，将是我终生感到欣慰的事。

最后，我还想说这本书的出版，得到了很多朋友的帮助，特别是宋仰之和前民两位先生更是出了很大的力。在此，我要对关心这本书的热心的朋友，对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表示衷心的感谢！

一九八四年十月于北京

引 子

一九三三年（昭和八年）九月末，“贝加尔”号正在横渡黄海。遥远的前方，在太平洋上隐隐地浮现着的一个岛影，那就是日本。

我走上甲板，目不转睛地凝视着那岛影。残夏的余热给秋风带来了一丝暖意，风吹着我薄薄的上衣。天气就要渐渐转冷了，可我还没有御寒的棉衣呢。

当时我年仅十五岁，远离父母，又无亲友，连一个相识的人都没有，孤身一人乘坐在从中国开往日本的轮船上。虽然前途未卜，但我已下定了与命运奋争的决心。

两天前，一个姓刘的朋友在大连送我上船的时候，一再嘱咐我：“一到神户，就会有叔叔饭庄里的人来接你。到那儿要好好干，要干一番事业

出来。还要多多注意身体。”可现在还有两天就要到达日本了。一种期待和不安的思绪使我的心怦怦地跳了起来。我要去的地方是大阪的“天仙阁”，到那儿以后就要开始干活挣钱了。

到了夜晚，我仰望着满天星斗，怀念着留在农村的双亲和姐姐们，想着自己到日本以后难以捉摸的命运，思绪万千，久久不能入睡……

绑票事件

提到中国的山东省，就会使人想到那儿有一个《水浒传》中英雄好汉们聚义的梁山泊。山东省位于华北平原东部，黄河下游。东边有伸出到黄海和渤海湾的山东半岛，西边是山地，那里有中国五岳之首的泰山。现在的人口，大概有八千万，仅次于四川省。在中国古代史上，山东的“黑陶文化”是很著名的。大约在公元前十六世纪到十一世纪从这一带一直到河南省安阳地方曾经是殷朝的版图。

公元一千六百年兴起的大清帝国到本世纪初灭亡了，以后建立了中华民国。由于袁世凯的专横和各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造成了极为混乱的局面。贫穷落后的中国，又陷入了更加悲惨的境地之中。正是在这个时期，一九一九年四月，山

东省的一个偏僻的乡村——栖霞县楼底村，一个姓郭的人家生了一个男孩，这就是我，父亲给我取名郭光甲。

我的父亲名叫郭友润，母亲林氏。我排行老四，大哥幼年夭折，上面只剩下两个姐姐。

我们的家境很穷困。我的父母原来住在福山县东周各庄村，在我出生以前搬到了楼底村。全家既没有房屋又没有土地，靠当佃农为生。日子过得很勉强。

当时的中国，外县移居来的外来户常常受到当地人的冷遇。唯独我们家，由于母亲是在本村长大的，父亲又是教过书的有点文化的人，常常给本村不识字的乡亲们代写书信，所以乡亲们对我们一家都很亲热。

我小的时候，可爱看打水了。我记得，并在村边上，父亲每次去井边挑水的时候，我总是跟在后头。父亲打满水，用扁担挑回来。他喜欢帮助别人，常常把挑来的水倒到左邻右舍的水缸中。那些壮劳力忙于农活而无暇顾及挑水的人家，对于我父亲的帮助是非常感激的。

在任何时代，小孩子总有强烈的好奇心。我

刚刚懂事的时候，总有一个疑问：“小孩子到底是怎么生出来的呢？”忍不住去问妈妈。妈妈看着我一副认真的样子，就微笑着说：“小光啊！你是从山里拣来的！”“什么？山里拣来的？那姐姐呢？”

“不管是小光，还是姐姐，只要是小孩都是从山里拣来的。”母亲这种哄骗小孩的话，年幼的我当时是信以为真的。现在想起来，还感到很有意思。

在我们村子里，一个月大概有六、七次集。到了集日，附近的农民和商人都聚集在这儿，买卖各种吃食、衣物、柴火、木炭等等。热闹极了，真象过节一样。我住在乡下，平时没什么可玩的，赶集就是我的乐趣。我的父母看到集市上出售的食品不能满足赶集的人们的需要，于是父亲就开设了一个小茶馆，在家里做了馒头和粽子拿到茶馆里去卖。

到了该上小学的那年，我得了一场重病，只好暂缓上学。这样到了十岁那年我才上学。

当时，因为家里穷，每天吃早晚两顿饭。我上小学的时候也是这样，从来不吃午饭。而且每天下午还要早退。回家来和两个姐姐一同上山，春天割草，秋天搂树叶，背回家来当做饭的柴

烧。尽管家中日子很艰难，但由于我是家中的独生子，所以父母非常疼爱我。

我上小学三年级的那一年，这种安静的日子由于一个意外的事件而受到了冲击。

那是炎夏的一个晴天。学校午休的时候，小学生们都到离校不远的河滩上去玩水。忽然从远处河南边的道路上，气喘吁吁地跑来了一个扛着锄头的农民，一边还大声叫嚷着什么。我们都不玩了，好奇地看着他。等他跑近了，才听清他喊的是：“红胡子来了！快跑吧！快把家门关上！”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只见那个农民的表情十分可怕，冲我们瞪着眼睛喊着跑过去了。

“红胡子是什么呀？”孩子们从来也没听过这个词。“红胡子？真有意思！能看看才好呢！”孩子们听到这个词，就会想到那是些长着红胡子的男子汉，大家正在七嘴八舌地议论的时候，老师来了。

“哎呀！你们还愣着干什么？太危险了！快到里边去吧！”老师们训斥着学生，把我们带回到教室里。然后，慌慌张张地关上了学校的大门。

过了一会儿，十几个土匪跑来包围了学校。

我们这才知道“红胡子”原来就是土匪。这是大人们
对土匪的称呼，我们小孩子当然不会知道了。

“快把学生交出来！”

从门外传来粗暴的喊声，老师们看来都很害怕，挤在一起，小声嘀咕着什么。

“还不快开门，你们这些混蛋！”

随着吼叫声，飞来了枪弹，“砰！砰！”把学校的围墙打了个窟窿。

“别打枪了！这就开门，千万别打枪！”

有一个老师实在忍不住了，一边用发抖的声音喊着，一边提心吊胆地开了校门。

土匪们蜂拥而入，用枪威胁着，让学生们都到校园里集合。

“哪个是姓林的小子？快把他交出来！”

本村的人差不多都姓林，所以不知道他们要的是哪一个。

“怎么了？没人答话呀，你们都姓林吗？哪个是财主的儿子？快把他交出来！”

暴跳如雷的土匪们最后终于找到了他们要找的孩子，原来他们是想抓走财主的孩子，再让他

们家用钱财来赎，好弄到大量的金钱。贪得无厌的土匪认为，也许这些孩子中还有有钱人家的孩子，所以，又从七十多学生中挑了包括我在内的二十来个，一同给绑走了。

当时我们这些孩子很无知，本来是被绑票绑走的，却象是去郊游似的，跟在土匪身后，还大声吵嚷着：“走啊！走啊！”老师们只能目瞪口呆地看着我们这样被带走了。

当晚，土匪把我们这一群孩子带到两县交界处的一个村庄里。这儿离学校大约五里地。小学校长和楼底村的村长到这儿来找我们，请求土匪把孩子们放了。经过了很长时间的交涉，土匪们终于同意把象我这样一般人家的孩子放出来，但他们不放有钱人家的孩子，并提出要求说：“一个星期内要带来五百块现大洋，如果晚一点，就要割掉孩子的耳朵，削掉鼻子！”一边说着一边还挥舞着大刀进行威胁。校长和村长赶快带着我们这些被放出来的孩子慌慌张张地跑回村子去了。

当时的五百块现大洋能买到整整一个村子，贫穷的楼底村没有一个人家能拿得出这么大笔钱。村里的长者商量的结果，决定以林家为首，